

任率英的艺术创造

王文章

时间的消磨,不仅不会使真正有价值的艺术珍品黯然失色,反而是愈见光彩。著名画家任率英以年画、连环画的杰出创造,为我国当代美术营造了一座璀璨斑斓的艺术宝库。从任率英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那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看到他那高超神妙的创作技法,看到他那融民族传统审美趣味和时代审美趋向于一体的独特审美把握,这些都融汇为他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艺术呈现和创作特色。

任率英从艺60余年,主要以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创作出5000余张连环画、年画作品,还有其他不少中国画作品。到了晚年,他又以极大的毅力,绘制放大《古百美图》和《八十七神仙卷》并赋色,使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再现工笔重彩神韵。任率英的创作以民族性、大众性和艺术的精妙境界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真可谓雅俗共赏。他的年画和连环画印数都很高,像年画《百岁挂帅》累计印数达400多万张,他的9种年画作品,一次性印数曾达到1700万张。由此可见他作品受到人们欢迎的程度。

任率英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古典小说、传统戏曲、古典诗词,也有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无论何种题材,他都十分注意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点。他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强调绘画要“注意不同的形象

和性格特征”,指出“同类型形象,但性格和长相却各不相同”,如他画年画《百岁挂帅》中的十二女将,都画得俊美矫健而又各具个性特征,画连环画《秋江》将陈妙常、潘必正的性格画得活龙活现,画连环画《白蛇传》,他对“白娘子、许仙、小青和法海的个性性格,做深刻分析,根据4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刻画头像。”他画年画《嫦娥奔月》、连环画《鲁智深》等,也都是先从研究人物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感情入手,然后确定人物形象的造型特点及如何表现。他在《浅谈古典人物画的生活经验》一文中说,即便画古典人物画,也最好能到故事发生的地方深入群众,了解地域特点、风俗人情、人物性格及有关传说、古迹等,也要寻找符合故事要求的人物形象和景物,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以便与从文学作品、历史记载、资料考据等材料里来的间接生活相结合而进行艺术创造。画历史人物,不但要研究人物的社会身份、思想情感、性格特征,还要研究其生活习惯和周围环境(诸如服饰、发型、用具、陈设和庭院楼阁、花草树木等),使其既符合主题要求,又具有必要的历史真实性。任率英绘画中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就是因为贯注了作者源自观察体验而又发乎内在情感 and 心智的充沛的艺术情思,才使之具有了活泼泼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任率英艺术创造的卓越成果,还得益于他高超神妙的艺术表现技法。任率英工于仕女画、深谙古典的传统技法,尤其是工笔重彩方面的艺术造诣尤令人称道。但不止于此,他的绘画还因

为对中国民间绘画和西方绘画的表现方法兼收并蓄,而使人物形象愈加饱满充实,作品愈加洋溢明丽清新气息。看他的年画,翻看他连环画的任何一页,画面结构的讲究,用笔的流畅生动,设色的准确和谐,愈审视愈觉尽臻其妙。挥纤毫之笔,妙墨落素,应手随心,宛若神巧,不由人不叹服。绘画六法之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都见作者匠心,看任率英的作品,给人留下鲜明突出印象的还有他绘画线条的表现力。中国画的线条是创造艺术形象和表达艺术意境的重要手段,任率英具有娴熟、高超的线条运用技巧和线条塑造形象的能力。他的作品线条工细、准确、飘逸、灵动、流畅,形式美感赏心悦目。当然这是有意味的形式。著名美术理论家伍蠡甫谈线条与绘画意境的关系有云:“意境的抒发过程,同时也是笔下线条的盘旋、往复、曲折、顿挫以及疏荡、绵密、聚散、交错的过程。线条的每一次运动和动向,都紧扣着每刹那运动心境的活动。”(见《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借用这段话来说明任率英绘画中线条运用的价值,再准确不过了。同时,他在高超线描基础

上娴熟运用工笔重彩绘画技法创造的艺术景象又别具一格。先生晚年呕心沥血绘制赋色的《古百美图》和《八十七神仙卷》,并非原样摹绘,而是进行了新的艺术创作,画幅增高、扩大,人物形象刻画更为生动,增补树木、花草、动物及环境场所,人、景、物交融呼应,赋色冷暖、深浅有致,浑然天成。著名书画家启功赞《古百美图》曰:“观者披图如见宋元妙迹。”任率英绘制赋色的《八十七神仙卷》,也同样堪称今人工笔重彩的经典杰作。

任率英以深厚的功力承袭传统,而又勇于探索创新,他和同时代的杰出艺术家共同赋予当代年画新的艺术面貌,并把连环画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任率英和同道艺术家的创作成就,标志着当代年画、连环画艺术创造所达到的境界,他们的作品超越时代审美趋向的变化,仍然可称为今天艺术创造的经典。任率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表现的题材和塑造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他的作品展现的民族气概和民族精神,也仍然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影响着今天的读者、观众。他作品的艺术魅力来自哪里?无疑,首先是精湛的艺术技巧呈现的精美的艺术创造。但他作品洋溢的



年画《嫦娥奔月》 任率英 作



连环画《鲁智深》 任率英 作

动态

4月16日,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高峰论坛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博导、专家50余名。论坛回顾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十一五”期间的成果,并展望“十二五”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朱黛云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的责任和意义更趋巨大,特别是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既有世界胸怀,更要有本土意识的关心。长江学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基础,研究才能在一种“对话”的视野下展开。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认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民族(国别)文学史家,这对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如何关注中国自身具有特殊意义。

复旦大学孙建教授以林纾《梅孽》对易卜生戏剧《群鬼》的改写,证明了跨文化过程中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贡献。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研究的前沿译学理论为比较文学研究开拓出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以《欧美文学与世界文学》为题,首先追溯了

“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与含义,界定了世界文学的标准,也谈到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对世界文学的界定,应同时兼顾文化普世性和文化相对性、经典性和可读性。对于我们中国学者而言,应通过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以及和国外汉学家的合作,促使中国文学有效地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文学的话题激起了大会热烈的讨论。长江大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认为,中外学术界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阐释,充满了歧义、含混与不确定性:一个是它抹煞了世界文学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产生只是到了各民族、各文化彼此密切关联的近代才产生;另一个是在空间维度上,世界文学不是各国文学的汇总,应该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与视野,厘清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的热烈争论使得本次高层论坛在比较文学学者与世界文学研究者间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引来了孙景尧、谢天振等多位亲历学科初创的学者们对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设立的历史追溯及反思。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论坛还重点讨论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人才培养与建设。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认为,必须让学生学会做标准的学术研究,而在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民族(国别)文学史家,这对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如何关注中国自身具有特殊意义。复旦大学孙建教授以林纾《梅孽》对易卜生戏剧《群鬼》的改写,证明了跨文化过程中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贡献。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研究的前沿译学理论为比较文学研究开拓出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以《欧美文学与世界文学》为题,首先追溯了

4月17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清代理学史》获奖及其学术价值座谈会在京举行。新闻出版社副社长郭书林、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健、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祖敏和李文海、朱诚如、应中伟、黄兴涛、杨共乐、王俊义、李帆、陶己、卢家明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座谈会。

日前,龚书铎教授主编,史革新、李帆、张昭军等著的《清代理学史》从近50万种图书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与会领导和专家纷纷对获奖作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贺,同时认真探讨了该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地位和出版意义。

“出精品”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实施

郭书林指出,像《清代理学史》之类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不仅是出版和文化的问题,更是关乎到国家、民族有没有想真正走向复兴、走到世界民族之林前沿的愿望。他希望出版界、学术界静下心来,把出版精品作为我们民族、国家振兴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把有积累价值的东西留给世界和后人。他建议出版界在学术界的指导之下,做好完善的图书规划,把我们的历史和当代创新的东西全面系统地整理好,并积极翻译国外有借鉴价值的文化项目,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出版社要制定长远计划,做好详细规划,培养好自己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选好自己的专业领域,静下心来做下去;要跟踪清史研究等重大项目,尽早早上去(提前五年或更早),认真审读相关资料,研究相关史料,组织有实力的作者队伍,深挖精髓,甄选出最好的立意、内容、角度,做深、做细;出版业要为国家的趋势研究把好门槛,出版制度一定要依靠主流趋势,订立严格标准和科学的规范,“出精品”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实施,坚持正确导向,要有自己的标准和品味;对于

一些依靠研究机构、学校和图书馆收藏的书籍要善于经营。另外,为了保证作者潜心研究,一定要给予作者丰厚的回报,并有针对性地形成良性运行机制。他说:“我对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期望和目标:一、树立高远目标;二、精心规划一批‘拿得出手’的好书;三、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制定严格标准;四、与时俱进研究市场,认真做到为学术服务。”

对学术的一种尊重

卜键说,前天,我去二炮医院看望了龚书铎先生,心情真是很难过,很沉重,医院已经给他上了呼吸机,基本上不能说话。我本

署“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为这套图书的成功提供了保障:几位“高端作者”历时五年潜心研究,保证了这套书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出版单位从责编、政策保证和组织安排上优先考虑重点图书的出版,特别是对于有较强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图书加大出版投入力度,落实到人,落实到具体时间,落实到具体进程,也是这套书成功的重要因素。

学术界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主编李文海说:《清代理学史》的出版、得奖,可以说是清史

纂修工程和清史专题性研究之间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关系的一个生动体现。《清代理学史》里面有很多创新的东西,过去很多人认为,理学到了清代就已经衰落,没有什么研究的,这种理解是相当片面的。100多万字的清代理学研究专著过去是没有的,作者们对清代理学的分析也是很有创新意识的,不同于其他专家。他们把研究对象放到大的政治背景下面、放到社会条件下面去研究,其唯物史观是非常鲜明的。我们一提起清史研究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资金出版这样一套书,在当今处讲经济效益的环境下,也呈现了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何祖敏从出版、编写角度介绍了《清代理学史》获奖的体会:一个是重点工程重点组织,再一个是重点工程要有重点作者,另外重点工程还要狠抓落实。他说,《清代理学史》纳入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点工作和新闻出版总

清新时代气息,画中人物充盈的生命活力,则更多得益于他贯注其中的真挚情感。任率英说,绘画“首先要热爱爱生活,爱人民,这是画家的感情问题,有情感艺术才有生命力”,唯此,他才锲而不舍、始终如一,在把握时代和大众的审美趋向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以独特的艺术创造贡献于时代和人民。

当今,我们已进入新的社会发展时期,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文化产品的丰富性自是今非昔比,在一个文化消费日趋兴盛的时代,人们更是强烈呼唤和渴盼有更多经得起时间消磨、有耐人寻味艺术魅力的经典作品出现。杰作的出现需要有不趋时不趋利的纯粹艺术家的精心创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看任率英的艺术创造,他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在今天仍然投射时代新意的创作更令人敬佩。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将再一次举办任率英作品展,在欣赏这些精品杰作的同时,我相信很多人会从心底生发对这位当代杰出艺术家的敬爱之情。人们经过时间考验之后的热爱,应当是对艺术家最高的嘉奖。

(作者为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时评

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一位文化人士,针对当前的文化环境现状发出感叹:“当前社会和媒体捧出的却是大量类似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之类的人”“从鲁迅到小沈阳,世人的精神文化落差太大了”。

这实际上涉及到文化的雅俗问题。通俗的大众文化与高雅的精英文化,具有各自的趣味和精神。通常来讲,在一个时代或社会中,文化大众占大部分,但是否因为众多个“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代表着大众的通俗文化消费,文化大师却没有几个,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严肃、精英的文化,对一个时代的生活、文化和精神的影响力、作用,就不及通俗的、大众的文化呢?

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生态、文化精神,到底应该是怎样呈现的?一般来说,文化应该是普及的、日常的,渗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这是文化的大众化的特点,但是,文化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一般的、普通的层次上,它还必须有一些能够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触及我们生命和灵魂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除了流行的、时尚的、繁华的部分,还必须要有深远的、博大的、宏远的内涵意蕴。我们需要伟大的文学、深刻的哲学、精致的诗学、宏大的美学、高贵的精神……我想这也应该是一些文化人士、作家,

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的反思。我们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我们就越会重视文化的内涵、美学的品位和灵魂的探索,让文化向更高的境界目标发展。从这样意义上谈,文化是高度发展,还是平庸化,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

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说,学术研究需要合作。这样的大项目需要合作,不仅学术团体、学术组内部需要合作,兄弟单位之间也需要合作。清史办、出版社和各学术单位之间在《清代理学史》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典范。

获奖与付出是相对应的

《清代理学史》的作者代表李

帆介绍说,撰写《清代理学史》的历程是非常艰辛的。每位作者都是抱着认真敬业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和作风时完成了课题组的任务,确保了这部书比较高的学术质量。他表示:“我们深知清史研究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清史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我们希望将来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开展调查和研究,使我们的清史研究更上一层楼,能为我们国家的清史研究和学术的进步贡献更大的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也介绍了龚书铎先生组织撰写这套书的情况。他说:当时龚先生领来这套书的学术任务以后,就表示一定把这套书做成精品。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逐字逐句地念,念一段,评判一段,评判得很严厉,推敲得很严谨,包括标点的修改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龚先生当时曾说这套书是一次挑战,为什么是挑战呢?因为清代

不断呼唤和吁求我们现在的时代,艺术界应有艺术大家、文学界应有文学大家、哲学界应有哲学大家的原因所在。文化艺术上需要有“高峰”,代表时代精神信仰、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显然,某些通俗的、低档化的文学艺术是承载不了这个担当的。值得警惕的是,我们的文化娱乐出现了一种倾向:拼命在满足人们低端的需求,甚至一些低俗的东西正在成为某些地区社会文化的“主流”。

作家梁晓声在剖析当代文化生态的文化演讲中曾说: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空前的繁荣、空前的满足大众的欣赏和娱乐的愿望,但是,与文化本身的功能相比,文化的品质却是欠缺的。所以,对当前的时代和社会来说,我们不仅需要“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代表的通俗、娱乐的大众文化,而且更需要那些高雅、严肃、体现着当今核心价值的高品质文化,并充分发挥其激励、引导、向上的作用。

这取决于我们对于自身“存”处境的自觉程度,以及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的反思。我们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我们就越会重视文化的内涵、美学的品位和灵魂的探索,让文化向更高的境界目标发展。从这样意义上谈,文化是高度发展,还是平庸化,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

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说,学术研究需要合作。这样的大项目需要合作,不仅学术团体、学术组内部需要合作,兄弟单位之间也需要合作。清史办、出版社和各学术单位之间在《清代理学史》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典范。

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说,学术研究需要合作。这样的大项目需要合作,不仅学术团体、学术组内部需要合作,兄弟单位之间也需要合作。清史办、出版社和各学术单位之间在《清代理学史》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典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其泰评价说,《清代理学史》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并有开拓性和原创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说:本书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本书的获奖,昭示出两个方面的导向:一是国家和全社会对创新成果亦即原创性成果的重视;二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汪学群认为,《清代理学史》的出版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理学史,有助于理解理学的内涵与外延,包括理学范畴的解读及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原总编辑王俊义说:这部大著是运用多种结合的研究方式、方法的一个范例。清史研究涉及面很广,如果仅仅采取单一直线的叙事方式、方法,就很难在一部书中将清史面临的众多问题和内容融为一体。为此,本书的编者巧妙地采用了多种结合的研究方式,比如运用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点和面相结合等方式、方法,就较为成功地论述了清史研究所包含的纷繁问题和宏阔内容。

要有高品质的文化追求

许民彤